

数字技术赋能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提升的逻辑理路

范五三¹, 刘昭良²

(1. 福建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8;

2. 福建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数字技术以其特有的数据分析、革新重组和智能化决策等功能, 为提升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带来了新机遇。面对当下技术发展掣肘、算法过度风险、数据安全隐忧等新问题, 引入适应积极老龄化趋势的数字技术, 推动数字技术嵌入与治理场景适配、体制机制融合与治理情境互动、多维理念驱动与科学治理协同等举措, 不仅可以有效地破解当前面临的难题, 也能为城市随迁老人再社会化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数字技术; 城市随迁老人; 媒介素养; 积极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 D669.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3853(2024)05-0486-07

Logical way of digital technology enabling urban migrant elderly to improve media literacy

FAN Wusan¹, LIU Zhaoliang²

(1.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2.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mobile Internet era,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its unique functions of data analysis, innov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and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ing the media literacy of the urban elderly. In the face of new problems such a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excessive algorithm risks, and data security concerns, the introduc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hat adapt to the positive aging trend, and the promotion of measures such as digital technology embedding and governance scenario adaptatio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integration and governance context interaction,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 driving and scientific governance coordination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but als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re-socialization of the urban migrant elderly.

Key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urban migrant elderly; media literacy; positive aging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 越来越多的乡镇农村居民涌入一二线大城市寻求更多的致富机会, 使当代中国一二线城市诞生出一个新的群体——“随迁老人”。不同于城市原住地老年群体以及有更多自主性的农民工群体, 随迁老人因照顾在城市生活的晚辈或是让自己得到更好的照顾, 不得不离开故土, 来到陌生的异乡开始自己的随迁生活。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数

据, 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26402万, 老年流动人口数量多达1372万, 占比5.2%, 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1]并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2]。由此可见, 做好城市随迁老人继续社会化与社会融合状况的相关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对这一群体的既有研究, 多聚焦于“主流社会和移民群体”二元对立关系的视角^[3], 也涉及

收稿日期: 2024-02-22

基金项目: 2021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FJ2021B117); 2022年度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一般项目(FJ2022XZB065)

第一作者简介: 范五三(1984—), 男, 福建大田人, 副教授, 博士, 博士后, 研究方向: 政治传播、思想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

这一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再社会化、群际接触及积极老龄化等。^[4]但以往研究忽略了从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语境出发探讨该群体如何在缺少家庭代际反哺情境下通过手机媒介等渠道来适应城市生活。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规模占15.6%。^[5]“银发网民”所占比例较以往有了显著提升,充分表明互联网逐渐向中老年群体渗透。但是,统计分析表明,近四成受访农村老人表示只会使用三个手机功能,会使用十个以上手机功能的农村老年人仅有22.77%。^[6]近来也有研究显示,一些随迁老人正使用智能手机,借助数字技术重构其生活关系网络,能动地解决他们的社交困境。^[7]这意味着,部分随迁老人正在通过自我技术赋权适应迁入地生活。虽然随迁老人群体的互联网使用意识开始显现,但如何以随迁老人群体的生活视角为主轴,帮助其积极适应数字化社会环境,这一命题在一定时期内依然存在。

一、数字技术赋能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提升的价值功能

数字技术通过精准数据搜索、高级数据分析、创新平台搭建、场景智慧分布及智能化决策支持等多重功能,显著赋能了城市随迁老年人媒介素养的提升。这一赋能过程不仅服务于短期目标设定,也支持长期的数字环境监测,确保在充分考虑随迁老人特定需求的同时,媒介素养能够持续、健康发展。通过这种方式,数字技术不仅助力城市随迁老人有效适应并融入快速演变的数字社会,而且还促进了数字公共领域的理性交流,推动了数字文明新形态的形成,为他们共享“数字红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条件。

(一)数字技术数据分析功能:精准化培育提升随迁老人媒介素养

数字技术通过智能化、精准化、差异化的多元策略,为城市随迁老人提升媒介素养搭建起基础性平台。一方面,数据分析的技术支持能够提升老年随迁群体“数字画像”的精确度。通过动态的数据分析,不仅能够精准识别和分析随迁群体的基础性需求、媒介使用习惯、个性化偏好等,也能为这一群体定制个性化学习内容。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适老化发展,加速了城市随迁老人的

数字融入与技能提升效率。通过对随迁群体动态持续多维度监测,使智能算法与数据分析推荐出的媒介内容更匹配这一群体的兴趣与能力水平,进而增强其融入数字生活的可行能力与内生动力。此外,精准的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帮助并识别城市随迁老人群体的互联网介入度、参与度、社交网络情况,并能借助进一步的媒介素养教育,加强深化其与社区、亲友等的联系,帮助他们加快融入数字化生活步伐。面对鱼龙混杂的互联网环境与层出不穷的虚假信息、网络诈骗等,数据分析功能可起到风险预警的必要作用,在数据抓取的基础上进行研判,揭示这一群体数字生活中可能面临的媒介风险,增强他们的媒介批判能力与风险防范意识。在应对“数字排斥”与“数字挤出”的挑战时,强化代际沟通与文化反哺也成为关键策略。借助数据分析手段能较为精准地识别代际媒介使用差异和信息消费差异,为家庭内部的文化反哺提供科学依据,引导家庭成员精准施教,从而实现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的精细化干预,促使其更好地适应数字社会环境。

(二)数字技术革新重组功能:全面化覆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挑战

在数字化思维日益普及的当代社会,优化并有效运用数字技术创新的重组潜能,创建包容且多元的组织和平台体系,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关键策略,也是帮助城市随迁老年人顺利融入数字网络空间的核心路径。数字技术的嵌入,实质上是对传统老年群体信息交流与社交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它通过时空维度的突破,重组了信息传递的功能,极大地拓展了数字服务的地理边界与受众覆盖范围。作为信息流动的加速器,数字技术的创新转化不仅强化了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注,还促进了跨区域信息的无缝连接和最佳实践案例的积累与传播,构筑了一个实体与虚拟相互支撑的信息生态系统,催化了代际知识的循环与资源的高效整合。在此背景下,构建一个高效、协同的社会支持网络尤为关键,这要求消除以往媒介素养提升项目中存在的组织结构障碍和认知偏见,以提高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提升工作的实施效率。需要指出的是,要使城市随迁老人在数字技术支持下媒介素养的提升达到预期效果,既需要“开放共享”和“清晰治理”数字治理模式的赋能,也需要帮助这一群体从信息获取广度与信

息理解深度两个维度出发,唤醒他们对数字生活的参与意愿,进而提升他们在融入城市生活中的社会可见度和自我价值感。通过策略性地部署数字技术和提供定向教育引导,营造更适合城市随迁老人数字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在深层次上推动他们的社会融合进程与个体福祉的全面提升。

(三) 数字技术智能化决策功能:差异化激活城市随迁老人数字动力

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的提升,核心在于促进城市资源与迁入地的深度融合与公平共享,其目标是帮助老年群体在新的生活环境里实现场景适应与心理融入,尤其是要借助数字技术智能化决策功能,在加强代际交流、缩减数字差距及提升生活品质方面,差异化激活城市随迁老人数字动力。一方面,应聚焦于运用数字技术的智能化与精准化导向,定制适合城市随迁老人的数字化应用环境与信息访问渠道。这涵盖两个层面:一是通过教育引导,使老年人能有效利用微信、抖音等社交应用,拓宽社交边界;二是深入分析老年群体的特定需求,如设计更为直观的操作界面、增加语音导航等功能,以贴合他们的生理与认知特征。此外,智能技术还应致力于消除老年人数字生活中的障碍,如开发适老化的视觉调节功能、紧急求助服务等,以确保他们在数字时代的生活独立性与安全感得到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在整合社会资源与创新养老服务模式上,数字技术智能化决策功能展现出其独特优势。通过智能设备收集健康数据并进行分析,既可为他们提供定制化的健康管理方案,又能为服务提供者精准匹配服务需求,推动养老服务向精细化、高效化方向发展。例如,依据健康监测预警系统提前采取干预措施,或在紧急状况下迅速启动智能服务平台的救援机制,减少响应延迟,这些不仅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通过增强其对数字技术的驾驭能力,激发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的活跃度与参与度,提升在信息化发展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数字技术赋能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提升的现实困境

数字技术作为重塑信息传播格局、促进数字社会交流的重要力量,被寄予提升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的时代厚望。但是在现实中,城市随迁

老人与长期居住在城市的老年人相较而言,在数字技术获取与媒介使用能力、数字信息筛选与媒介辨识能力、社会参与与情感联结等方面呈现出的困境差异性,使他们较难顺利融入数字化社会。在面对快速变迁的数字环境时,城市随迁老人对数字技术和媒介需求所展现出的不同特征与需求,成为数字技术赋能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所应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 数字技术获取与媒介使用能力有待提高

从数字技术可及性的角度考量,城市随迁老人因生活环境的骤变,往往在到达城市初期面临着技术资源获取的限制。与之相比,城市老年人长期处于信息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环境中,对各类智能设备的接触更为频繁,从而在使用习惯与技能积累上占据优势。此差异凸显了环境因素在技术采纳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应着重关注数字技术普及的地域不均衡性及其对特定人群的影响。同时,学习动机与能力的差异亦不容忽视。城市老年人在享受退休生活的同时,往往拥有较强的学习动力,倾向于通过新技术丰富精神生活、维持社会联系。相反,城市随迁老人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首要任务可能是解决基本生活需求,加之可能存在的学习信心不足、数字恐惧心理,导致其在主动寻求技术学习方面动力不足。这种动机与能力的不对称,进一步加剧了两群体间的技术使用差距。再者,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亦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城市老年人往往能依托家庭成员、朋友及社区组织等既有的社会网络,获取技术支持与学习资源。相比之下,城市随迁老人的社会网络重建尚在进行之中,缺乏即时有效的技术辅导与情感鼓励,使得他们在面对技术难题时更容易感到孤立无援。因此,社会支持的差异成为影响技术采纳效能的又一重要因素。

(二) 数字信息筛选与媒介辨识能力有待提升

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提升,是一个涉及媒介素养、老龄化社会与数字鸿沟等多维度议题的复杂话题。从理论上讲,信息筛选与辨识能力是指个体在信息海洋中识别、评估、选择并有效利用信息的能力,是媒介素养的关键组成部分。对于城市老年人而言,长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更可能

接触到多样化的信息源,参与数字社会的互动,从而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信息批判思维和甄别技巧。相比之下,城市随迁老人由于生活环境的突然变化,加之之前较少接触复杂的网络环境,他们在信息筛选过程中可能更容易受到误导,表现出较低的辨别力。这种差异根植于信息接触经验的积累和数字素养的培养,反映了信息素养发展的路径依赖性。有研究表明,城市随迁老人在面对健康咨询、理财产品推广等网络信息时,更容易轻信未经验证的内容,部分原因是缺乏必要的网络素养教育和实践经验。^[8]而城市老年人虽然相对具有更高的警惕性,但也并非完全免疫于网络谣言和诈骗,这说明信息辨识能力的提升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与个体的终身学习态度密切相关。此外,社会网络结构的差异也影响着信息传播的质量与可信度,城市老年人的社会资本往往更有利于获取高质量信息资源。诚然,数字技术为城市随迁老人融入数字生活带来了便利性,但伴随而来的信息筛选与媒介辨识问题,成为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提升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

(三) 数字社会参与与媒介情感联结有待加强

社会参与与情感联结作为衡量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在当前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其维系方式日益受到媒介技术的影响。媒介作为社会互动的中介,不仅承载信息传播的功能,还扮演着构建社会身份、维护人际关系的角色。城市老年人由于长期浸润于城市文化和数字环境中,他们更可能利用社交媒体、视频通话等媒介手段保持既有社会关系并建立新的社交网络,这种媒介使用模式促进了其社会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增强了情感联结的紧密度。相比之下,城市随迁老人由于环境的突变与社会网络的重构需求,其媒介使用习惯可能仍停留在较为初级的阶段,如仅限于电话沟通或简单信息接收,这限制了其通过媒介拓展社交边界、深化情感交流的潜力。既有研究表明,随迁老人在城市中的社会孤独感往往更为显著,这与他们在新环境中建立基于共同兴趣或邻里互助的线上社群活动参与度低有关。^[9]同时,由于对城市文化、方言等不熟悉,城市随迁老人在社交媒体上的表达和互动可能会遇到更多障碍,这进一步削弱了其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和媒介使用的频率效率。表面上随迁老人群体与数字时代并

轨,实际上低密度的社会参与与情感交流会削弱这一群体与社区、家庭的情感联结,影响其幸福感与社会融入度,成为数字技术赋能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提升的掣肘性因素之一。

三、数字技术赋能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提升的实践路径

“数字化生存”与老龄社会新形态双重叠加背景下,构建好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的实践场景,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时代选择。数字技术赋能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提升,既要顶层设计的宏观情境出发,为提升媒介素养和参与城市生活提供一个全新愿景,又要从当下城市随迁生活的微观结构和具体场景出发,帮助他们在融入城市生活中更好地拥抱数字文明。

(一) 推动数字技术嵌入与治理场景适配

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提升这一群体的“数字化生存”能力,应将数字技术的治理逻辑嵌入“顶层设计”的视野之中。数字技术的引入给城市社会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精准把握媒介素养提升与积极老龄化二者之间的价值演化规律与趋势能对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产生积极影响。提升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作为一个社会再动员、再组织、再塑造的过程,需在推动数字技术嵌入与治理场景适配的同时,注重相应的价值体系建设,使他们运用媒介的能力得以提高并从媒介使用中受益。与此同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倡导全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各级政府做好发展规划、积极拓展社会多方合作,倡导代际和谐并存,将促进个体老年人社会参与转向促进全社会公民对老龄社会的参与,为消弭老年数字鸿沟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促进“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一方面,政府要成为数字技术普及与积极老龄化战略顶层设计的“主导者”和“推送者”,转变新媒介素养提升的思维模式,充分考虑随迁群体在环境变更及技术资源获取上的限制问题,推动制度环境与应用环境的双向适配。数字技术治理逻辑体现了一种先进性、时代性的治理理念,该逻辑的嵌入必然会推动传统治理模式的更迭,用新的制度体系匹配数字环境,取代因技术资源获取困难、技术普及地域不均、社会支持系统动力不足而产生的旧问题,实现对以往体系的新变革与新

实践。在体系构建与制度推进的双重拉力下,数字技术的嵌入将变得更加灵活、自然,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推动的场景适配也能适用于不同产业的协调治理。“互联网+”模式的渗透能够拉动电商、旅游、教育等行业的资源引入,并随着经济的增长不断增强其可行能力与市场份额。在应用场景适配方面还可以考虑“数字+”模式,如数字消费、数字医疗、数字政务等,推动新型治理体系与数字治理体系现代化。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引入为城市随迁老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赋能方式。城市随迁老人有别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态,所以顺应“下沉”的媒介化发展趋势,筑牢以提升媒介素养助力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帮扶体系成为应有之义。例如,政府建立老年人数字技术培训中心,提供基础操作、网络安全、社交运用等数字化工具;成立志愿者队伍,为老年群体提供数字技术指导,解决其在使用数字设备时面临的技术问题;建立老年数字社区,通过在线平台分享经验,交流技能。同时,应将“数字技术法治化建设”思维纳入顶层设计的架构之中,培育与塑造法治化的媒介环境。在强调法治建设与产生效能相结合的基础上,更好地保障城市随迁老人媒介化生存的正常权益,改变社会公众对城市随迁老人使用媒介的固有“偏见”,提升合目的性的积极老龄化战略在新媒介时代的影响力。

(二) 推进体制机制融合与治理情境互动

数字技术与体制机制的高效融合能够正视并弱化技术发展迅速与老年群体媒介化能力脆弱之间的矛盾。体制机制的革新与推进能提升老年群体的主体性与发展能力,解决“信息贫瘠”问题。因此,提升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成效,不光要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关键在于强化这一群体素养与技能的培育机制。

一是推进体制机制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构建上下衔接、运行有效的老年教育政策体系。既有研究表明,提升媒介素养和技能,成为解开老年人“数字围城”困境的重要途径,而“教育”是提升老年人媒介素养的关键因素之一。^[10]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结构性矛盾显著、主体素养差异大等问题,通过教育来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成效并不显著。因此,老年教育要坚持走内涵式高质量发

展道路,在政策体系的纵向支撑与横向协同下,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将老年教育纳入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提升体系之中,增强随迁老人面对多样化信息源时的识别、评估、筛选能力。当然,追蹑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提升与积极老龄化二者的理路脚踪,通过教育实现技术赋能是缩小群体性能力差异的表层因素,更深层次的理解应指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导向下,推动智媒时代的这一群体媒介素养提升与人的全面发展。

二是通过数据融合与内外协同,打造数字技术下的治理情境互动。大数据的分析能力与数据连接能力能塑造出属于个人的不同“信息网”,面对复杂多样的社会信息环境,通过数据融合,分情境进行数字社会治理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数字技术的治理优势,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还能丰富场景治理的“建设智库”。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提升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仅靠老年教育或提高数字设备拥有率难以全方位提升老年人的媒介生活需求。在媒介化生存治理的现实场域中,应强化该群体的数字应用能力,将其融入到积极老龄化的大语境中去寻找价值依据和战略诠释,推动多主体间形成内外联动的帮扶合力,增强该群体的媒介辨识力,使随迁老人的社会网络愈加可靠,构建出数字化、规范化、标准化的治理模式,帮助他们经得住社会考验与实践挑战。

三是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智慧城市建设,提高城市随迁老年群体在共享数字红利时获取媒介资源的再生产能力。要正视媒介技术深度嵌入城市随迁老人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化需求,加强政府、社会及相关机构与该群体的联系,在建立多主体间互信机制的基础上,重构老年人社会联系网络,在推进城市随迁老年群体“再社会化”进程中,实现对老年个体的精准赋权与增能。^[11]需要指出的是,积极建构不同主体关系网络,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媒介反哺”功效,消除老年人的感知困境,更好地实现媒介素养的代际传递,提升其主观幸福感,使其充分享受媒介化生活带来的便利,为有效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提供坚实助力。

(三) 强化多维理念驱动与科学治理协同

激发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的内生动力,前提条件就是要激活这一群体的发展潜力,使其主动拥抱媒介化生存方式,在跨越“数字鸿沟”中享受智媒时代媒介生活的便利。数字技术赋能视角

下,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提升的内在动力,应置身于一个动态运行环境中,从遵循“理念驱动、关系驱动、资源驱动”三个维度中加以审视,强化多维理念驱动与科学治理协同。

一是理念驱动。在跨越数字鸿沟和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背景下,激发内生动力以唤起城市随迁老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破解智媒时代“数字围城”问题的根本之道。一方面要优化服务方式,坚持数字技术时代的人本理念。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相关帮扶举措时,可以借助数字技术的分析搜索与整合能力,改善适老化产品的应用场景,不断提升涉老场景服务的智能化水平。^[12]另一方面,正视这一群体的发展权利和能力缺失问题。从正反两方面推动农村数字媒介接触弱势群体对数字技术的全面认知、态度转变与行为发生,^[13]避免其在数字媒介生活场域中出现非理性现象。因此,要将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提升问题融入数字政府的服务理念中,在契合媒介技术创新发展趋势的同时,提升他们实践发展行为的新媒介效能。

二是关系驱动。家庭语境下的技术赋权并不是一个伴随技术采纳和使用自然发生、一蹴而就的过程。^[14]城市随迁老人可以通过线上与线下的“关系”提升自身的新媒介素养,这符合我国乡土文化的路径,亦验证了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的重要价值。数字技术的赋能不仅有助于随迁老人在异地建构起新的社会身份,打破孤立感,还有助于提高该群体的社会参与度,逐渐与数字时代并轨。^[10]当前正是我国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关键阶段,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提升农村老年人数字素养。一是凝聚更加广泛的社会共识,形塑城市随迁老人的媒介形象。这种独特的“情境”差序格局更应值得关注,城市随迁老人数字排斥问题的发生更应重视“重塑主体障碍”,使他们能够在“内圈”人和“外圈”人、“圈外”人和“圈内”人的转换中,找到属于他们的话语权和主体性。二是

通过“关系”提升城市随迁老人的媒介素养及数字技能水平,更好提升这一群体对新媒介使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三是资源驱动。资源驱动力不仅可以进一步提升城市随迁老人媒介素养,也有利于实现不同主体的角色重塑与资源重配,推动媒介化与适老化同步提升。整合媒介资源不是简单的“库集合”和“库链接”,其最终指向是要聚焦于城市随迁老人群体的特殊需求。通过技术补缺、多方协同、制度补丁和系统集成等举措,形塑符合本土化特征的媒介素养提升机制,更好帮助这一群体获取媒介资源和使用能力。在推进积极老龄化的战略进程中,用有温度的技术践行数字人文关怀,特别是在“数字赋能”与“社会温度”的时代语境下,善待“数字弱势”群体,为凝聚新的社会共识提供一种新的动力、场域及“共同语言”,也为提高城市随迁老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提供持续动力。

四、结束语

掌握数字智能技术是老年人共享发展红利、提升生活品质的必然趋势。本研究以“数字技术”为“术”,以“积极应对老龄化”为“道”,全面分析了城市随迁老人这一群体在数字化时代所面临的诸如数字资源非均衡性供给矛盾、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与重塑的不确定、结构性障碍难以破除、受教育程度参差、代际关系平衡遇阻等时代困境与现实挑战。在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战略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引入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其数据分析、革新重组、智能化决策等功能,不仅能帮助城市随迁老人更好地获取信息资源、掌握急救知识、拓宽社交范围,提升他们在数字时代的安全感、存在感及价值感需求,而且还能使他们以新“进场”的方式接入互联网并适应数字生活,赋能好城市随迁老年人群体在数字生活中的角色、价值、身份、认知等多方面的转换与提升。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92.
- [2] 白雪蕾,兰亚妮.“老漂族”,身心漂泊的双重困境何以破解[N]. 光明日报,2021-01-14(7).
- [3] 彭姝玮. 法国移民的融入困境:《查理周刊》血案引发的思考[J]. 当代世界,2015(3):45-47.
- [4] 刘庆.“老漂族”的城市社会适应问题研究:社会工作介入的策略[J]. 西北人口,2012(4):23-26,31.

- [5]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4:32-33.
- [6] 加强数字反哺 让老年人远离“网瘾”[EB/OL].(2023-10-08)[2024-02-22]. <https://www.workercn.cn/c/2023-10-08/8005359.shtml>.
- [7] 农村老年数字困境如何破解? 专家建议老年互助、多样性应对[EB/OL].(2023-03-28)[2023-11-14].https://e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23-03/28/content_5752.htm.
- [8] 吴凡,绳宇. 社会支持网络、自我效能及健康促进行为对老年人影响的路径分析[J]. 中华护理杂志,2019(11):1701-1706.
- [9] 张栋,徐紫涵. 随迁生活感知、城市社会适应与随迁老人心理健康[J]. 城市问题,2023(12):90-99.
- [10] 张大伟,谢兴政. 农村中老年人提升新媒介素养的“关系”路径研究[J]. 新闻大学,2022(8):1-16.
- [11] 王张华,张平平. 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政府责任与实现策略[J]. 人口与社会,2022(1):18-31.
- [12] 杨江华. 数字化与老龄化共振中的难题何解[N]. 光明日报,2021-04-27(2).
- [13] 郭小良. 乡村振兴视域中的农村居民媒介接触:数字赋能与纾困释能[J]. 编辑之友,2022(7):54-62.
- [14] 熊慧,李海燕. 权威延展与“益能式”反馈:随迁老人智能手机赋权的家庭语境及其实现[J]. 新闻大学,2022(8):17-30.

(责任编辑:王圆圆)

(上接第 453 页)

- [22]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发布《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系列行业标准的公告(文旅科教发〔2023〕66号)[EB/OL].(2023-06-29)[2024-03-2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8/content_6900702.htm.
- [23] 边媛. 参与式文化遗产数字化建档的理论基础、模式与路径探析[J]. 档案学研究,2021(3):90-96.
- [24] 胡莹. 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建档范畴与原则探析[J]. 档案学通讯,2016(3):99-104.
- [25] 王亚琦,成朝晖. 设计智造系统下的传统活化探索[J]. 家具与室内装饰,2022,29(9):6-9.
- [26] 刘文良,黄洁. 数字时代苗绣智慧化传承的困惑与破解路径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2023,30(1):68-74.
- [27] 王楠,吴金凤,宋东阳. 基于文创 IP 产品开发的非遗数字化建档与服务研究:以传统图案纹样为个案[J]. 档案管理,2023(4):61-63.
- [28] 梁爽,周敏,周橙旻,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严肃性及娱乐性[J]. 家具与室内装饰,2022,29(4):50-54.

(责任编辑:王圆圆)